迅速城镇化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乡村风貌如何避免“千村一面”

郭慧岚

文化遗产专家将目光投向了乡村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快速城镇化的社会发展过程。乡村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既保持传统文化精神风貌、又更新提升居民生产生活质量的实践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过程中所经历的“千城一面”现象，是否也会再次重新出现在乡村？

“许多传统村落把那建筑都修得整整齐齐，以为这就可以成为传统村落了。实际上，传统村落里不同时期的、各种类型的建筑共存，这才是最好的。千万不要都弄成一式的，那就完全失去了它的价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侯卫东研究员认为：乡村建设也正面临着“千村一面”的危机。

同样，一些地方追求建大亭子、大牌坊、大公园、大广场等“形象工程”，偏离了村庄建设重点；一些地方模仿、照搬城市模式或其他“网红乡村”模式，脱离乡村实际；有的地方甚至存在破坏乡村风貌和自然生态等突出问题。同质化、低档次、缺乏特色的乡村旅游比比皆是，乡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真实风貌正在流失。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遗产保护计划开始聚焦到世界各地的乡村，推出了Ruritage项目，即乡村（Rural）+遗产（Heritage），旨在保护和推动文化遗产在乡村地区实现可持续和活化再生的巨大价值。

2017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9届大会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以下简称《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获得通过。在世界各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开始倡导将乡村景观作为一种值得珍视的遗产予以保护。ICOMOS的2019年年度会议主题即为“乡村景观”。

保持乡村景观遗产价值盯住3个环节

乡村景观遗产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将乡村景观遗产保护下来做什么？乡村景观遗产对我们每一个人、对世界发挥着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很好的答案。”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帆教授说。“乡村景观遗产有3个基本价值：知识与技艺、生存智慧以及和谐、美、多样性。”杜晓帆特别强调，由于各地村落的自然环境不同，历史形成过程不一，再加上文化结构差异，所以造成“乡村景观遗产”种类众多，类型千差万别。但恰恰是这种独特，成为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的“国土文化景观”的基本构成，“如果没有村落，国土都会没有识别性”。

目前，乡村景观遗产涵括的内容有土地、水、基础设施、植被、聚落、乡村建筑、交通和贸易网络、相关的文化知识、传统和习俗等。这种复合型遗产特点，导致国内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演化出多种多样的命名方式，衍生出多种名称，如“乡村遗产”“乡村文化遗产”“乡土建成遗产”等。虽然尚无统一的乡村景观遗产定义，但专家们普遍认为，从全局视角来看，乡村景观遗产主要包括世界遗产地、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和农业遗产等。

乡村景观遗产保护理念具有文化资源方面的先天优势。以此来观察中国广阔国土上的城镇化进程，专家们认为，应该集中力量，加强保护文化风貌的3个核心弱项问题：管理、保护以及资金。目前，乡村景观遗产规范尚不健全，存在一些社会风险、安全隐患和制度缺失；在保护上，修缮失范、翻建泛滥、技艺失传三大问题尤为突出，而在资金投入环节，社会资金普遍投入保护和再生的前景尚不清晰。

年轻的乡村景观遗产会是一条新路径？

与此同时，融入到具体乡村重建与振兴工作时，乡村景观遗产专家也同样面临社会转型中的普遍困境：在传统风貌信息保存相对真实完整的地区，常常伴随着农业生产率低下、土地浪费和空村化现象严重、产业升级支撑和创业人才培养缺位等现象。人才传承过程中，乡村匠作在内的传统技艺逐渐失传，残存的传统手工艺因产值极低而难以为继。于是，乡村景观遗产的生存方法，也不得不依赖传统村落建筑的租赁及民宿开发，但这也恰恰促成了发展途径同质化，难以形成差异化，导致“千村一面”现象更多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少量具有优质观光资源的乡村景观遗产尚未起到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

在乡村景观遗产管理问题上，不少专家都提到应该加快制度和体系建设。

中国科学院院士常青教授提到了乡村景观遗产存在着“名分交叉”的问题。“乡村景观遗产中的传统聚落会被认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村或传统村落，一部分村落拥有双重以上名号。这样管理条块分割或一事多管的局面造成了乡村景观遗产认知标准、管控机制和处置方式的交错和低效，也因此产生了各地入选的传统村落良莠不齐的现象。”常青说。“针对乡村景观遗产，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套合适的乡村建造体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董卫教授说，“现在只有各种‘禁止做什么’的规定，还没有出台‘应该怎么做’的一套乡村建造体系。”

链 接：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特别强调：“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

（摘自：农业农村部网站）

能否找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

如何处理乡村景观遗产保护与乡村发展的关系，专家们产生了一些认知判断上的分歧。

杜晓帆认为，乡村景观遗产保护工作，恰恰和当下正在经历的历史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连，并且乡村景观遗产保护往往要让位、让步于乡村发展，这无形之中将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

不同于杜晓帆“保护往往需要给发展让步”的无奈，侯卫东则认为“发展是更加重要的”。他说：“以传统村落为例，所谓‘传统’未必全是先进的、优秀的，传统村落也需要发展。传统村落里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必然会随着发展而改变。例如：村里的土路会铺上砖头、有些居民会开民宿和商店、饭馆等。这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为了保护所谓的‘传统’而阻止村落发展，只能慢慢地在二者之间找个平衡点。”

那么，如何去找这个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呢？专家们将焦点瞄准在完善制度设计、技艺传承、分类处置方面。常青提出了“名分归口”方案。他认为，以实现乡村景观遗产管理的集中、高效为目标，进一步理顺相关机构的乡村景观遗产管理体制及机制，对各部门交叉重复的部分作必要的归口调整，每处乡村景观遗产应就高归口一种保护名分进行管理。侯卫东也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乡村景观遗产保护的制度设计，尤其是要明确传统村落的界定与责任主体。

专家们对于乡村技艺传承保护的重要性的认知高度一致，但关于“如何对乡村景观遗产进行分类处置”，则思路不尽相同。侯卫东认为应该将乡村景观遗产分为“开放”“不开放”两类，结合乡村的实际情况，把握住“开放”的度。

常青则建议将乡村景观遗产分为标本类保存和景观类保护两大类型，对二者采取不同的处置手段和再生方法。在标本类保存的乡村景观遗产中，他建议按民族、民系的语族区或方言区全覆盖，成体系地作分类分级梳理，为后世存续完整的遗产谱系标本，进而确保大部分谱系均有典型标本被保护法规和评价系统所充分认定和实施落地。

董卫也强调，构建有效的乡村建造体系必须进行“一定的分类”，但他认为“按民族、民系的语族区或方言区全覆盖”的分类方式过于泛化。他的思路是，综合考虑各地的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进行分类，例如盛产木材的地区，可以构建起一套独有的木质建筑建造体系。

上图：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的建筑格局按“八阵图”样式布列，且保存了大量明清古民居。村落保护发展制度较为完善，建立了本村的传统建筑修缮工匠队伍，采用传统的方式修缮古建筑。它也因此成为专家们频繁引用的实现村落自我“造血”模式的范例。

左图：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引入市场机制，打造“关中印象体验地”，成为当地发展较快、村民分红多的旅游村。看着袁家村火了，周边乡镇也开始“复制袁家村”。但因为没有挖掘自己的历史文化底蕴，同质化严重。“千村一面”再没能复制出一个像袁家村这样生意红火的民俗村。

哈喇巴拉嘎斯出土了唐朝玉册

白居易撰文玉册重现世间
中国学者关注亚洲内陆历史变迁

徐 弛 文/图

2019年夏季，我利用暑假假期前往蒙古国做一次短期旅行，实地踏查我的论文研究的地域——漠北地区。由于我的研究方向是唐朝与北方草原民族关系史，因此本次旅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寻访蒙古高原上与唐朝有关的遗迹。

以一个外人的眼光来看，蒙古国境内的公路交通还算不上便捷。寻访遗迹时，多半时间都要开车在草原上狂奔；桥梁也极少，有时面对河对岸近在咫尺的遗址，却只能望而兴叹。如果没有当地人带领，很难找到散布在辽阔草原深处的遗迹。因此我们提前联系好了蒙古国考古研究所的学者巴图宝力道，由他带领我们前往寻访。

玉册是我国古代册书的一种，形式模仿简牍，册文直接镌刻在编联成册的大理石或汉白玉册条之上。唐代的玉册，多为皇帝封禅、告祭、随葬和册命所用。《唐六典》记载，册书“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表明唐封册皇太子、后妃、亲王、贵臣及外蕃用玉制的册书。于是，玉册无疑是检视唐朝与周边部族关系的珍贵物证。

此前，我曾与导师李锦绣前往俄罗斯哈卡斯共和国阿巴坎市，调查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封黠戛斯可汗的玉册。此次旅行路上，我向巴图提起这段经历。出乎意料的是，这提醒了巴图。他告诉我，回鹘都城哈喇巴拉嘎斯遗址好像也发现有类似文物。我当时就预感，这其中应该会有新发现。

8月18日，我们到达哈拉和林附近的回鹘都城哈喇巴拉嘎斯遗址，感谢巴图已联系好正在这里进行发掘的考古学家。这个遗址由蒙古国-德国联合考古队负责发掘。考古队员已在此辛勤工作了数年。

新出土的玉册，是在城东南角高台上的水井中被发现的。早在10年前，该遗址北部的宫殿-寺庙建筑群中，就曾发现过一枚断裂的玉册残片，残片上有3个字，只能清晰识别出一个汉字“云”。由于传递出来的信息量太少，因此这枚残片没有受到关注。但这次可不一样，水井中出土了大量玉册残片。看到的第一片玉册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上面有汉字“于天下气无”；其余残片还有疑似唐年号“宝历元年”、代表回鹘可汗的尊号“没密施”等字。这应该是与回鹘可汗有关的玉册！我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记录下玉册上的部分文字；征得考古队专家同意后，第一时间发回给我远在北京的导师，大家就在现场开始研究起来。

我们用无人机拍下的回鹘都城遗址，玉册在城东南角高台上的水井中被发现。

右图：蒙古国-德国考古队公布的“于天下气无”残片，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片玉册。

我回到国内后不久，蒙古国-德国考古队就在网站上公布了他们的最新考古发现，其中包括我们看到的玉册残片。但在最新刊布的简报里，这些考古学者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些发现可能蕴含的重要价值。

玉册文笔出自白居易？

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来自北京的回复就初步判定了玉册的内容：这是用于册封的玉册，而非随葬的祭文哀册。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看到的玉册残简上的中文文字，居然可以对应由大诗人白居易撰文的《册回鹘可汗加号文》。在传世文献中，这篇册文被留存下来。《白居易集》中就录有此册文的完整文字，开篇写道：“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某月朔某日，皇帝若曰：北方之强，代有君长，作殿玄朔，宾于皇唐。粤我祖宗，锡乃婚媾，五圣六纪，二邦一家，此无北伐之师，彼无南牧之马，兵匣锋刃，使长子孙，叶德保和，以至今日。”玉册上的汉字，能够对应的是文中的词句“声有闻于天下，气无敌于荒外”。我们看到的玉册残片，本来文字竟如此豪迈！这个唐代大文豪的手笔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根据唐朝制度，玉册的撰文者与书写者往往不是同一人，而是另有专门的书手书写，并由刻玉册人负责镌字。因此玉册上的笔迹，应该不是白居易的书法。

但是，我们看到的“宝历元年”残片文字，却没在白居易文中出现。专家分析，是否我们看到的这批东西，源于多个玉册？

巴图很快联系上考古学家，确定玉册上的笔迹并不相同。唐代史书记载，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回鹘崇德可汗卒，弟曷萨特勤立”。也就是说，这批玉册，可能是分属两个可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崇德可汗因“声有闻于天下，气无敌于荒外”而被进册加号毗伽可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唐又“册回鹘曷萨特勤为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毗伽昭礼可汗”。

写有“宝历元年”的那片玉册，可能就是唐封第一片玉册主之弟曷萨特勤为可汗的玉册。

哈喇巴拉嘎斯城址附近的九姓回鹘可汗碑。

考古队公布的发现玉册的水井照片。

价值尚待进一步研究

当然，这些初步判断，都将等待考古工作者及历史学家在随后的深入研究中，详细判读这些文物的真实年代，逐步还原历史事件的原貌。

唐玄宗天宝年间，回纥（后改为回鹘）汗国兴起，统治了漠北地区。回纥一直心向唐朝。不仅如此，回纥还伸出援手，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加上2009年在该城发现的玉册，回鹘汗国首都哈喇巴拉嘎斯城址中已出土了数十枚玉册断简，分属于至少3套玉册。玉册的发现可以证明，安史之乱后，唐朝虽不再处于鼎盛期，但回纥汗国一直受封于唐朝；玉册体现了唐对漠北地区的管理制度。在这次发现之前，蒙古国发现了汉代的“燕然山铭”；此次发现的唐朝册封回鹘可汗玉册，引发的关注程度足以与“燕然山铭”相比。白居易的诗文上千年来经久不衰，此次与他直接相关的文物在漠北重新现世，在文学领域，也应算作一段佳话。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